
卻顧新聞所來徑，一片滄桑橫脆危

—台灣的新聞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林麗雲***

摘 要

本文旨在檢視過去五十多年來台灣的新聞史研究。它指出，在歷史的辯證過程中，不同時期的政治變遷下，台灣的新聞史研究可能有所轉變。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下，新聞史研究以特定的觀點來編寫，排除不同的解釋，造成某種「社會失憶症」(social amnesia)。到了1970年代末期，當反對勢力興起，對立的觀點逐漸浮現。近來，在政治自由化的潮流下，社會上不同的團體開始重拾記憶，重建歷史，也帶來研究上的契機。展望未來，本文建議，研究者應以本土的傳播文化為主體，分析在歷史的過程中各種脈絡的文化如何在此交織並交融出特殊的傳播文化，以開闢這個學門的歷史視野。

關鍵詞：新聞史研究、新聞研究史、歷史與時代、歷史與政治

* 本文初稿曾在「中華傳播學會2000年會暨論文研討會」中宣讀，承蒙評論人鍾蔚文教授及匿名評審提出重要建議，特此申謝。作者也感謝《傳播文化》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

**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程宗明先生的討論、政大「傳播資料庫研究小組」劉昌德先生提供部份研究資料及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古淑薰同學協助蒐集部份文獻，在此一併致謝。

***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助理教授。Email:maco1049@mails.fju.edu.tw

壹、為何要回顧新聞史研究

五十多年來，台灣的新聞與傳播研究，在前人的辛勤播種與揮汗耕耘下，已由一片荒蕪，轉為今日欣欣向榮的景象。例如，在老幹與新枝的傳承下，這個學門的研究產量及人力已有大幅的成長（鄭瑞城, 1995）。然而，放眼望去，我們可能發現這片園地中，歷史面向研究的數量相當有限。它宛如花圃中不為人顧的小盆景一般，稀稀疏疏三兩枝。例如，汪琪與臧國仁（1992:404）及羅文輝（1995:D34-35）分析過去五十年來台灣傳播學門的學術成果，結果發現其中歷史性的研究尚不到 5%。

造成歷史性研究明顯不足的原因，可能有二。首先，從 1960 年代以來，前輩學者到美國學習傳播主流典範中的研究方法後，引進美國社會科學量化的方法，從事定時性的研究，較不注重歷史研究（程宗明, 1999a）。其次，在過去威權統治下，歷史性的研究頗為敏感¹。因此，即使有些研究者對新聞史感到興趣，但可能會因為政治上的考慮，而在面對歷史性的議題時，選擇繞道而行。

如果傳播學門持續忽略歷史面向的研究，則可能產生幾個相關的結果（林麗雲, 1999；2000）。首先，如果我們缺乏歷史性、動態性的研究，將無法透視本土傳播體制的問題。尤其對於鉅觀、控制面、制度層次、長期變遷的問題，我們將無法分析其性質與成因、轉變及轉向。如此，吾人將無從認識過去、了解現在、並找出未來的可能走向。

其次，如果研究者缺乏歷史方面的知識，可能很難涵養出研究

¹ 李鴻禧（1987:8）指出，過去政府疑慮「台灣史」及「台灣史研究」會提升台灣意識，甚或惡化為「台獨思想」，遂對「台灣史」及「台灣史研究」懷抱警惕戒慎的態度。

中所需要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主要包括兩方面（葉啟政，1994：73-76）。第一，是研究者能反省自身所處的歷史情境如何形塑研究者個人的問題意識、方法論的立場、理論的位置，以及社會實踐的態度。第二，是研究者能理解研究對象如何在歷史的過程中發展出特殊的文化形態。如果研究者沒有這種對歷史情境的反省力與洞察力，只把現有的理論或模式套在本土社會上，則可能會造成「絲線把脈」的誤判與誤診²。

再之，長期以來這個學門忽略歷史面向的研究，並未有系統地蒐集史料，因此文獻資料已一點一滴地流失，老成人物也一個一個地凋謝。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當下不努力，則日後將徒傷傳播史研究的滯礙難行。

有鑑於新聞傳播史研究的重要性與急迫性，近年來部份傳播學者呼籲，未來應注意此面向的研究與教學（潘家慶，1997；程宗明，1999a；翁秀琪，2000；林麗雲，2000）。潘家慶更擲筆長嘆，謂「（傳播學門中）…歷史方面的研究，一片空白，可嘆！可惜！」（潘家慶，1997:2）。

所幸，目前部份研究者正邁出新步伐，從事歷史相關的研究，試圖揭開過去神秘的面紗。他們嘗試分析已往在威權體制下（主要是1949年國府遷台以來），國家如何控制媒體，並影響媒體的發展（例如，程宗明，1999b；林麗雲，1999）。可以預期的是，未來在研究者不斷的努力下，一個煥然一新、信而可徵的歷史圖像將逐漸

² 傳播學研究中「絲線把脈」的現象是由朱立教授所提出。在「中華傳播學會2000年會暨論文研討會」中「論壇討論：中華傳播學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學者對話」，朱教授提出此看法。他指出，在1980年代以前，居住在美國的華人傳播學者在研究華人社會的傳播現象時，往往挪用西方既有的理論與模式，套在當地社會之上，因此所做的分析並不完全貼近當地社會的本質，甚至有七成以上的分析含有謬誤。

形成。傳播領域中歷史面向的研究也將枝葉茂盛，花果豐碩。

當我們正要挖掘史料、重寫歷史時，有必要先展讀國內新聞史的著作，分析其探討的主題與論述。主要的原因有三。

首先，如前所述，過去五十多年來，傳播新聞史研究受到忽視。但是，仍有少數前輩學者以新聞傳播史為題，發憤撰書並累積成果。前輩研究的軌跡可做為我們未來出發的依據。他們研究的精神與經驗也可做為我們師法的對象。經由這樣的回顧，我們將能鑑往知來，也會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看得更高、更遠。

其次，我們回顧過去新聞史後，將可了解整體而言目前新聞史所勾勒出來的圖象為何？這個圖像有什麼問題與限制？還有哪些面向是尚未觀照到的？這些部份正是未來研究者應能著力之處，因為正如英國文化史家 Burke（1997:59）所言，歷史學者的工作「即是把人們可能會忘記的事情告訴他們」。經過這樣的檢討與反省，我們將能在新聞史的研究領域中，再闢新圃，栽出前所未有的花果，達到前人未及之境。

再之，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回顧過去五十多年來新聞史的寫作，我們可了解現有的歷史知識具有哪些的特質？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其形成與傳承？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歸納出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過去五十多年以來，台灣的新聞史研究之主題與論述有何轉變？這些轉變又給我們以怎樣的啟發？

貳、分析架構：歷史研究與時代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分析過去五十年來台灣的新聞史研究，是屬於史學史的分析，也是歷史學研究的一種。在歷史學的研究的途徑中，*解釋的途徑*主張研究者應提出自己的解釋架構，做為分析的

起點，以整理史料，並讓史料不斷地修正此解釋架構(林麗雲, 2000 : 44)³。循此途徑，吾人在研究新聞史的書寫前，將先從相關的文獻中，尋繹出可能影響歷史寫作的因素。有了學理上的基礎，我們將能對本文所要探討的案例提出較有力與較有意義的解釋。

首先，自從 Ranke 提出客觀的史學研究方法後，客觀學派即對史學研究有重要的影響 (Appleby et al., 1995)⁴。這個學派基本上認為，史學家的主要工作是挖掘史料、弄清真相，然後不偏不倚地、客觀地、完整地呈現真實，讓「歷史自己說話」(Ranke, 1970:57)。在此假定下，這個學派認為，歷史是對過去的原音重現，歷史的書寫不會因為任何因素(如史學家個人偏好、或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

但是，這種看法卻忽略了史學研究與時代的關聯(余英時, 1979:2)。正如 Burke 指出的，歷史書寫是一種「社會的記憶」(social memory)。在概念上，正如集體記憶的研究者 Halbwachs (1992 : 182-183) 指出的，這類記憶不僅是個人的心智活動，更是由社會團體共同建構的。以史學家的工作而言，他們會受到其內在基模 (schema) 的影響來選擇題材、解釋資料及呈現過去；而他們內在基模又是受到所處時代的影響，因為史學家是社會的一部份，也是社會的產物⁵。

³ 拙作〈為台灣傳播研究另闢蹊徑？傳播史研究與研究途徑〉(林麗雲, 2000) 分析傳播史研究的三個主要分析途徑(歷史主義的、客觀的及解釋的)，包括其意義、淵源、優點與限制。在此不再贅述，

⁴ 這個學派也正是余英時(1979)所說的「史料學派」；它對中國近代的歷史研究有重大的影響。

⁵ 正如 Carr (1987) 指出的，要了解歷史著作，必先了解作者是誰；而要了解作者是誰，則必須了解作者的時代背景。

因此，歷史作品可能會受到時代因素的影響⁶。例如，當 20 世紀初，大英帝國還坐擁「日不落國」的尊榮時，英國歷史學者多相信，歷史將是直線前進的，一如帝國國勢將持續蒸蒸日上（Carr, 1987:43）。但是一次大戰後，英國國勢日衰，英姿銳減，英國史學家 Toynbee（1963）於是提出與前人不同的史觀。他認為歷史的變遷並非直線前進，而是循環的。之後的英國史學家普遍也認為歷史的發展並沒有特定的型態。

其次，再就社會中權力運作的過程來看，歷史的書寫可能會受到一個時代中的社會權力影響。正如人類學家 Douglas（1986:112）說的，「任何體制想要維持良好的狀況，就必須控制其成員的記憶」，讓他們忘記一些經驗，特別是那些可能危及體制正當性的部份。這個過程也如 Gramsci（1979a; 1979b; 1983）所說的「爭取文化霸權」（hegemony）；也就是說，社會中的權力集團（power bloc）傾向控制意識型態，以維持在社會中的優勢地位，而歷史書寫即蘊含著認同等意識型態的因素。

以國家社會而言，每個時代的統治者大多會試圖影響歷史的書寫，以建立國民的認同及共識。例如，Appleby 等人（1995:91-99）指出，美國在建國的前夕，社會中包含不同的族群，各自懷抱不同的信念，追求不同的利益，並沒有所謂的全民共識；然而，當時「愛國」的歷史學者卻編織一套「美國人的共同傳統與精神」，為「美國」建立了 Anderson（1999：11-12）所說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即讓分散各地、互不相干的住民產生「同仇敵愾」、「同舟共濟」的情感。這些歷史學者指出，美國是啟蒙運動的產兒，為爭取自由而奮鬥不懈，這種奮鬥最具體的實踐則是反殖民運動及「獨立宣言」。為了讓這種說法顯得強而有力、信而

⁶ 即使歷史學者想要超越時代的限制，他們也必須深刻地反省其所處的時代。

可徵，歷史學者把原本互不相關的事情與傳說接連起來，打造美國的民族英雄，並把他們界定為全國人民的共享記憶。這種歷史書寫召喚國家社會中的每個人、點名每個人，讓每個人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知道如何成為國家社會中英勇的份子。

當社會用特定觀點來解釋過去時，某些觀點可能受到忽略。尤其當這些觀點不利統治集團時，可能會被斥責為「邪說異端」。統治團體甚至必須銷毀某些版本的歷史，嚴禁某類的歷史寫作，或限制某些議題的談論。人們可能會因為驚嚇過度而必須學會自我監控（self-censorship），三緘其口，保持沉默。久而久之，某些版本的歷史或人物可能不見經傳，灰飛煙滅，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Burke稱這種情況為「社會失憶症」（social amnesia）（Burke, 1997:57）。

所幸，「社會失憶症」的患者並非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他們雖然不能公開追憶過去，但是被壓抑的歷史可能仍然埋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在其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層次。他們在不經意的時候，可能會想起過去的種種。Burke（1997:57）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來說明這種情況。根據他的親身經驗，保加利亞曾歷經多次革命；每次革命後，新政府都會改掉街道名，重新用具有革命意識的字眼來命名，並全部換掉路標，目的是讓人們完全忘記舊時代，隨時隨地記得效忠新政權。但是，當Burke向路人詢問舊街道的所在時，他們還是能不假思索地指出正確的位置。換言之，雖然舊街道名字在官方的地圖上被塗去，但是它們在人們腦海的舊地圖中並未立刻消失，正如被壓抑的記憶很難一筆勾銷。

因為被壓抑的記憶不會立即消失，所以「社會失憶症」並非無藥可救。假以時日，意識底層的記憶可能會被召喚出來，與主流的記憶對抗（Shotter, 1990:128-131）。特別是當權力中心不穩時，人們會開始侃侃而談，不再害怕說出內心真正的想法。因此，底層的聲音會重新發聲，挑戰過去的文化霸權。例如，美國自1960年代越

戰失敗後，社會運動迭起；再加上教育普及後，部份非白人、女性、勞工等背景的人進入學院。這些過去處於邊陲位置的人開始為自己尋根，重建記憶，也為弱勢者發言。這段時間，美國史學界「由下而上」的歷史書寫蔚為風氣。研究者不以政治精英為研究主題，而以受壓迫的常民百姓（包括婦女、兒童、勞工、弱勢族群）為探討對象，分析其人口的變遷、生活型態與工作情況等（Appleby et al., 1995: 135-139）。這時，弱勢者的記憶可能會被吸納，甚至成為主流。因此，從歷時性的觀點而言，歷史的書寫可能是一個動態的辯證過程。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由於社會中的權力運作，某個時期中，歷史研究可能關心特定的主題（如，政治、社會或文化等），追憶特定的人（如，精英或常民），或提出特定的解釋（如，何者為王？何者為寇？何者為英雄？何者為梟雄？）。同時，在選擇性的機制下，某些主題可能被遺忘。但是，當物換星移、高谷陵夷、世事變遷後，被遺忘的部份可能再被拾起，受壓抑的也可能得到紓解。因此，在不同的時期，歷史研究關心的主題及提出的解釋可能有所不同。

參、新聞史研究與時代的關係

經由以上關於歷史與時代的討論，我們了解到，由於社會權力的運作，在不同時期，歷史研究的主題與解釋可能有所不同。以台灣的史學研究而言，政治權力的運作可能影響歷史的書寫。張炎憲（1996）指出，自國府遷台以來，在官方的大中國意識型態下，學界以大中國為本位；直到1970年代末期，在反對運動的推動下，開始有「台灣結」與「中國結」的辯論；到了1990年代，當「本土化」的論述逐漸取得文化霸權後，學界逐漸以「台灣」為主體。有鑑於

政治權力可能影響台灣的史學研究，本文將依台灣的政治變遷作分期來分析各時期新聞史研究的特質。

一、威權政體下建構的新聞史（1949-1976）

1949 年間，國民黨政權在兵敗如山倒的情況下，痛失故國神州，踉蹌顛沛，渡海來台。一到台灣，國民黨即指稱：在蘇維埃政權的操控下，朱毛匪幫建立了偽政權，竊據國土，奴役同胞；海內外中國人必須肩負起反攻復國的神聖使命，拯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語出蔣介石在 1950 年對台灣人民的談話，收錄於張其昀編，1984: 3321-3324）。這套「反攻聖戰」的意理不只是口號，更是國民黨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的基礎（即法理基礎）。有了這套說詞，國民黨即宣佈：在戡亂時期，為了國家安全，必須施行非常時期的法令（如戒嚴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結果凍結了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與自由。於是，黨政軍情治單位有令箭在握，可如「老大哥」般監控台灣社會。

國民黨政權為了強化以上這套正當性的說詞，把自己說成是中國古聖先賢與文化道統的繼承者，而中國共產黨則是非法的竊據者與破壞者。例如，當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國民黨隨即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指摘「毛賊倒行逆施」、「自絕於五千年歷史文化、自絕於七萬萬大陸人心…」，並宣稱其「文化復興運動」將能「以篤實踐履之功，達成我們復國建國的大業，光大中華民族文化的新生命，開拓三民主義的新時代…」（語出蔣介石的「中華文化復興節紀念詞」，收錄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編，1968:4-6）

在這個文化作戰的過程中，歷史扮演著 Douglas 所稱「控制人民記憶」的角色（見本文第貳部份的討論）。具體而言，在國府主政之下的台灣，各級學校的歷史教科書多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統談起，再分述中國歷代各朝，最後把民國以來國民黨政

權發展史接黏上去（張炎憲, 1996:435）。而且，為了強調國民黨政權正是這個道統的繼承者，歷史教育特別強調國民黨領導國人建立民國、北伐統一、剿匪及抗戰的經過。而這段近代史的研究也特別受到史學界的重視⁷。

這類「本國史」排除了 1949 年之後中國共產黨政權在大陸的發展，因為它被視為「匪偽政權」，不具正當性。同時，「本國史」也排除了台灣史的部份（特別是 1945 年前的部份），因為在大中國的意識下台灣是中國的附屬。這兩部份的歷史研究（中共史及台灣史）是史學上的禁忌，也正是統治者亟欲從人民的記憶中抹掉的。

這套以大中國為主的史觀也反映在新聞史的作品中。國府來台之後即引介大陸籍新聞史家戈公振（1982）於 1915 年在大陸寫成的《中國報學史》（以下簡稱戈著）。大體而言，戈著頗為嚴謹。當時的新聞學（或稱「報學」）剛在中國落地生根，戈氏首先釐清「新聞」、「報學」等概念，並比較各家定義。接著，他再對中國報業史的發展作分期，包括官報獨占時期、外報創始時期、民報勃興時期及民國成立以來的報業發展。

戈著提供 1950 年之後在台灣的新聞史學者一個基本架構。首先，研究者多師法戈氏的分期與範圍。例如，曾虛白編（1966）《中國新聞史》與賴光臨（1978）的《中國新聞傳播史》即仿效戈氏的分期與寫作順序⁸。其次，研究者也多以戈著提到的報業與報人為探討對象。例如，賴光臨（1968, 1970, 1971）、李瞻（1977）及朱

⁷ 例如，國府到台灣後，在 1955 年於中央研究院年設立「近代史研究所」；而清朝以前四千年的中國史研究則屬於「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範圍（見中研院網站中對各所的介紹）。

⁸ 雖然歷史的分期並非絕對的，而是根據作者所關心的主題、理論的出發點來作劃分（Weber, 1949:181-185），但是，這個時期的研究者並未提出解釋性的架構與分期的原因，而是直接對新聞史作切割。

傳譽（1967）等人專書研究戈著所提的宋代報業、清末新型官報《萬國公報》等。

在戈著的基礎上，研究者進一步擴充中國新聞史的範圍，建構了一個更完整的「中國新聞史」。他們的書寫在以下幾方面強化了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

首先，戈著只從漢朝的邸報談到民國初年的報刊，而在前述曾虛白及賴光臨編著的書中則上溯先秦前的傳播活動與思想（包括古代的《詩經》、《尚書》），再談漢唐宋元明清，然後以清末到抗戰時期國民黨黨報為重點，結尾把1949年國府遷台後「自由中國」的新聞事業連接到中國新聞史上。這種書寫如接黏劑一般，把國民黨領導的新聞事業與四千年中國傳統的道統與文化連結起來。

其次，戈著對民國以來的新聞史（特別是國民黨的新聞媒體的部份）著墨較少；但是，曾虛白及賴光臨的著作則明顯地加重了國民黨新聞媒體的份量。以賴光臨（1978）的《中國新聞傳播史》為例，在全書九章之中，有五章以（親）國民黨的報刊為主軸，強調這些報刊對國家有重大貢獻，如宣揚革命理念、鞏固領導中心、對日抗戰、不屈不撓。書中也讚揚多位報人為「典範」與「英雄」。例如，章炳麟在「蘇報案」中的表現使「民心為之大壯」；戴傳賢則對「袁世凱的帝制…力加抨擊」；「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張季鸞所發表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則「使得叛軍首領『頓感失敗的命運在眼前』」（賴光臨，1978:96, 132, 172）。此外，其他研究者（如徐詠平，1946, 1960, 1973；劉光炎，1952; 1956; 戴豐，1960; 邢頌文，1961; 陳紀滢，1957, 1974, 1981）也分析（親）國民黨的報刊與報人。

其次，在「反共抗俄」的年代中，當國民黨將中共政權被視為「匪幫」及「偽政權」時，新聞史也自然將中共統治下的新聞事業視為不具正當性的「偽宣傳機器」。因此，在台灣所出版的中國新

聞史極少觸及中共的新聞宣傳體系。即使稍後台灣部份學界及政界意識到必須知己知彼，但他們仍十分戒慎小心，以避免落入「為匪宣傳」的口實。例如，到了 1979 年，中共的新聞事業已在大陸發展三十年，曾虛白等人遂翻譯德國人 Mohr 所著《現代中國報業史》，因該書涵蓋了中共新聞事業的發展，「具參考價值」。但是，曾氏同時也鄭重聲明：「所缺憾者作者（Mohr）以客觀恣（姿）態，將共匪與日製傀儡組織控制下之資料與正統新聞資料並列衡量，殊非忠黨愛國之我輩所能容忍…；因此，編譯者「只決議影印絕少數份，編號送交有志研究中國新聞史者機密參閱。」結果這個影印版本只供少數人閱讀，沒有列在主流新聞史著作中。⁹

再之，這段時間在台灣出版的本國新聞史著作中，台灣新聞事業位居邊陲。例如，主要的新聞史書籍很少討論台灣新聞事業。以台灣新聞事業為研究主體的書籍更是付之闕如。這種情況反映了一個思想框架：在大中國之下，台灣只是中國邊陲的一省。

更具體來講，這段時間，只有少數論文是以日據時期台灣報業發展為分析對象。論文中，研究者多強調：在日本政府的高壓統治下，部份的台灣知識份子受到中國民族運動與重要人士的啟發，起而發行刊物，從事社會運動，反對殖民統治，並以回歸祖國懷抱為最終目的（洪桂己，1957, 1962; 朱傳譽，1965）。吳三連與蔡培火（1971: 544）即指出，「因為台灣民報的努力，臺灣的知識份子和祖國五四運動以後的民族精神與思想文化纔能連接」。

這種解釋觀點基本上是史學界中的「內地化論」---即用大中國的觀點來看台灣史，認為台灣文化（如政治經濟制度、民風習俗等）都是來自中國大陸，是原鄉文化的移植（林美容，1996:41）。這個

⁹ 引號文字出自曾虛白在《現代中國報業史》（莫爾,1979）第一冊中的「虛白聲明」。

論點是立基於史學家郭廷以¹⁰（1954）所著的《臺灣史事概說》。該書明白指出：自明鄭時代的反清復明、清代的民族革命、反日本殖民，都是台人對中國的嚮往或民族精神的表現。根據這種論述，台灣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向中國學習的歷史，台灣的進步源自中國對台灣的施政。這種論述可用來正當化台灣與中國的關聯性（張炎憲，1996:446）。郭廷以（1954）在《台灣史事概說》的引言便開宗明義說，「台灣之為中國之不可分的一部分，…別具用心的人，往往故意把它（台灣）與中國分開，多方歪曲事實，甚至憑空捏製謊言，以圖遂陰謀詭計。」因此，國府可用這個論述來駁斥台獨的論點。

上述的新聞史書籍中的「內地化論點」形成了社會中主流的解釋架構。它點出了台灣文化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因此對台灣傳播史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台灣文化除了汲取漢文化的養分外，也受到南島文化、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影響，而交織並交融出一種新的文化型態（戴寶村，1989：7）。然而，在國民黨的正當性危機下，如果有人強調台灣文化的特殊性與主體性，則可能被視為鼓動「分離意識」，而被當作「叛亂份子」、「一小撮台獨野心份子」。例如，史明（1980）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是以台灣為研究主體，用左派台獨的觀點，分析在國際的政經結構下，外來政權（包括日本及中國）如何剝削台灣，而台灣人如何追尋自主意識。根據他的說法，日據時期台灣人所發起的社會運動及所發行的刊物，主要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上自由平等及民族自決的世界潮流影響，最終的目的是追求（台灣）民族自決。這種說法與主流論述中的「內地說」有所不同，也直接挑戰了官方的意理。因此，在1990年代以前，史氏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用日文寫成，在東京出版）只能在海外部份的台灣人社團中流傳，禁止進入台灣島內。

¹⁰ 郭廷以在中央研究院創辦近代史研究所。在他的影響下，1970年代前台灣史學界多以「內地化論」來研究台灣史（張炎憲，1996：446）。

在資訊封閉的台灣島內，人們只能壓抑部份不見容於官方的記憶，整個社會也逐漸染上歷史的「失語症」與「失憶症」。但是，正如 Burke 所說的，這些病症的患者並非病入膏肓、無可救藥（見本文第貳部份的討論）。人們還會記得一些刻骨銘心的事。然而這些記憶清醒的人卻可能是最痛苦的，因為在威權統治下他們「有口難言」。其中，有人選擇用筆來治療內心深沈的哀痛。例如，在二二八事件中，許多報紙被關；報人被捕、被殺。但是，在這個時期，新聞史的著作卻幾乎沒有記下這段。整個社會噤若寒蟬，不敢輕談。只有少數人偷偷地留下些記錄。例如，吳濁流悄悄地用日文記錄上述報業被鎮壓的情況與經過。在這個時期，他的文章只能「藏諸名山」，等待有朝一日能「傳乎其人」，提供線索給後代史家來回顧過去（吳濁流, 1988a, 1988b, 1988c）。

二、威權政體鬆動下爭議中的新聞史（1977-1986）

上個時期的新聞史著作一直有影響力。原因之一乃是，國內的新聞傳播學系大多把新聞史課程列為必修，因此這些書籍有一定的銷售量，並能持續出版。同時，這些書籍中的知識與解釋，也透過教學，傳給歷屆新聞傳播科系學生。而且，在社會上遴選優秀新聞及傳播人才的考試（例如政大新聞研究所入學考試、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試、考試院的新聞行政人員考試等）中，這些知識也是重要的內容¹¹。以 1970 年到 1980 年的政大新聞研究所入學考試為例，「新聞史」是必考的科目；在該科的四大題中，每年至少有一題（占該科計分的 25%）是出自前述新聞史書籍（李瞻, 1986: 353-368）。例如，1970 年有一題是「試述中國國民黨黨報系統之發展與貢獻」；它假定黨報有重要性及貢獻，並引導考生從這個方向思考。因此，

¹¹ 李瞻（1986:353-368）詳細臚列年來新聞史的考題，以供讀者準備考試的參考。

學子若要在體制中「出類拔萃」、「出人頭地」，必須熟讀這些書籍，記誦其論述，再把內容搬上試卷。

但是，這些新聞史著作要形塑學子的共同記憶，卻有其限制。首先，如前所述，新聞史著作作為連結國民黨政權與中國道統，會關注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期的發展。作者並企圖將其社群所擁有的記憶（如革命報刊的發展、黨報系統的建立、抗戰時期的報團發展等）變成台灣社會的共同記憶。但是，到了 1970 年代，對 1949 年後在台灣出生的青年學子而言，「故國神州」已十分遙遠，遠在其經驗範圍外。因此，他們不大容易在一學期的課程中，即建立起感同身受、身歷其境的回憶。

其次，如前所述，在威權體制下，這些新聞史著作的歷史解釋是定於一尊，不容質疑，也排除了其他的解釋觀點。因此學生在學習上多以背誦為主，較少有思辯的機會。他們也不大容易從研習歷史中，發揮社會學者 C. W. Mills (1959) 所說研究上的「想像力」，來發掘社會變遷的可能因素。因此，他們似乎很難很背誦中激發出研究的興趣。例如，在 1977 到 1987 年間，104 篇政大新聞所的碩士論文中，並沒有新聞史方面的研究（統計自政治大學傳播研究資料庫）。

更重要的是，主流新聞史以大中國為範圍，忽略了台灣當下的發展，¹² 結果卻把自己囚禁在學術的象牙塔裡，逐漸孤立在台灣社會外。因此，當戰後台灣的內外環境發生急遽變遷時，學院中新聞史研究無從解釋，也無力回應，更無法與 1970 年代變遷中的台灣社會進行對話。

¹² 朱立在「中華傳播學會 2000 年會暨論文研討會」中「論壇討論：中華傳播學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學者對話」的談話中指出，當時台灣的新聞傳播學術可「左顧右盼」、「東張西望」（即參考東洋及西洋的發展），卻不能研究台灣本身的問題。

在這風起雲湧的年代，台灣的內外環境接二連三地發生重大變化。外環境上，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的重組深深地影響國府的地位。當時美國為了與蘇聯對抗，謀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不惜犧牲與國府的關係。國府在失去了美國的支持後，被迫離開聯合國，並失去國際社會的承認。國府在得不到外國的承認後，其所宣稱的「代表中國」及「反攻大陸」變得愈來愈可疑，正當性的基礎也越來越薄弱。當威權統治站不住腳時，社會中開始出現批判的聲音。1977年，無黨籍人士高舉「黨外」的旗幟，公開批判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正當性，指出反攻聖戰已成為神話，應恢復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拓荒者出版社，1979）。到了1980年代，部份黨外人士的訴求更從爭取參政權與言論自由，拉高到爭辯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張炎憲，1996:439）。

黨外的力量已壯大到足以撼動國民黨的權力基礎，因此國民黨即運用報業來壓制黨外的聲浪。國民黨所用的是「蘿蔔與棍子」的策略。也就是說，一方面它懲罰違反政策的報社（如《台灣日報》、《自立晚報》及《民眾日報》等）；另一方面，它給予「友報」（如《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優惠及好處（林麗雲，1999）。在黨國控制下，報社的立場與言論多配合黨國的文宣。例如，當時王惕吾（1981:20）在其所寫的《聯合報三十年》中即宣揚其辦報的理念：「…新聞自由不能超越、也不應超越反共復國國策與和諧團結的要求…」。他顯然認為反共及國家團結的目標比言論自由還重要。官方的文宣主管也感謝當時報業的配合。例如楚崧秋（1967年1月到1980年6月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即感佩，當時主要報紙的負責人多能「共體國難」，配合新聞宣傳的需要（楚崧秋，2000年7月7日，訪問錄音）。

但是，相對於報老闆樂意接受國民黨的收編，部份新生代的記者卻感受到職業角色的矛盾與困境。這些新生代是二次大戰後在台

灣出生，其「反共復國」、「效忠黨國」等心理包袱較輕，而且他們在新聞採訪過程中較能感受社會上求新求變的心理，也目睹一些政治的內幕。但是，在「新聞室的社會控制」及情治單位的關切下，他們卻不能講真話，必須三緘其口，學會與謊言共處，只能暗自怨歎「知是痛苦的…無知便是福…」（顏文門, 2000年3月31日，訪問錄音）¹³。

部份記者為了突破這種困境，選擇公佈國民黨的新聞控制。例如，吳哲朗（1978）的《黨外的新聞：台灣日報的辛酸史》即是在這個情境下寫成。書中描述當時《台灣日報》言論政策的改變過程，以及身為記者的壓力。該書指出，1970年代兩大報急遽成長，嚴重壓縮到其他報紙（如地方報）的生存空間。《台灣日報》為了生存，嘗試以黨外新聞為賣點（吳哲朗, 1978:375）。因為當時的黨外運動是以省議會為主要的論政舞台，《台灣日報》乃制定「以省議會新聞」為掛帥的言論政策，並由吳哲朗負責。不久，《台灣日報》受到國民黨多次警告，旋即被強制把報證賣給軍方，而吳哲朗則被限制出境。吳哲朗則一一揭發這些內幕。他的書寫直接挑戰了傳統新聞史的論述及未觸及的媒體控制。

對於這種媒體控制，一些知識青年路見不平，「拔筆相助」，發憤為文。例如，陳國祥（當時是政大新聞研究所研究生）（1978）在《夏潮》上發表〈新聞自由的歷史對照〉一文，極力批評國民黨的新聞控制與報業喪失報格。根據他的比較，早先在1958年當國民黨強行通過《出版法修正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規定行政機關有權撤銷報紙和雜誌的登記執照），各報莫不奮力維護新聞自由，據理力爭；但是，當國民黨在1978年以一紙行政命令停止雜誌登記，沒收圖書時，各報卻一言不發，只為一己謀利。

¹³ 顏文門在1970年代末期是《聯合報》的記者兼副採訪主任及政治組召集人。

對於以上國民黨的新聞控制，當時風起雲湧的黨外雜誌可能心有戚戚、感同身受，因為它們即經常活在查扣、沒收、警告的陰影中。因此，黨外雜誌有許多文章指責國民黨對報業的所作所為。其中有些文章著重歷史面向的討論，因為黨外可以利用國民黨過去的新聞控制來強化其反抗的論述（莊英村，1985）。例如，林濁水（1982）在《博觀雜誌》發表〈三十年言論自由奮鬥史〉一文，分析官方的新聞控制與民間爭取自由的意志如何在歷史的過程中一再地拉扯與拉鋸；重要的例子包括二次大戰後初期陳儀政權與民間報刊、1950年代蔣介石政權與《自由中國》及《公論報》以及1970年代蔣經國政權及黨外雜誌等。

以上新生代的作品與前個時期學院的著作有很大的不同。新生代的書寫間接地挑戰了老一代的，雖然兩者並未正式交鋒打筆仗。前個時期的新聞史是以「大中國」的觀點為主，特別強調1949年前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執政的時期。研究者大多歷經過大陸時期動盪不安的情況，因此寫作上會從國家民族大義的角度出發，排除不利黨國的部份。這些歷史著作主要在體制內的學院流傳著。

相對地，新生代的書寫則以台灣的新聞事業發展為主體。他們多從「自由主義」（即反對國家對言論自由的控制）的觀點出發，明白揭露國民黨的媒體控制，因此間接地指出學院內著作「視而不見」的部份。有的黨外編輯甚至把歷史書寫當作是社會運動的一種反抗策略（李筱峰，1994年12月訪問）。因此，他們的作品主要在體制外的領域流傳著。

三、政治自由化下重構中的新聞史（1987-）

到了1980年代末期，上述體制外的歷史書寫逐漸爭取進入體制內。在1980年代中期，國民黨在內外的壓力下採取容忍的態度，並

宣佈解嚴（王振寰, 1989）¹⁴。自此，台灣的威權政體朝向「自由化」的方向，即國家機器解除對人民權利的限制（如言論、集會、組黨等自由）。而國民黨本身更必須面臨新的政黨競爭。

由於國民黨處於競爭之中，為了保有政權，必須吸納反對黨的意識形態。當反對黨人士以「台灣意識」作為主要訴求時，國民黨也不得不朝向「本土化」及「台灣化」。因此，國民黨的領導人蔣經國臨終前說出：「我也是台灣人」。繼任的李登輝也必須道出：「台灣人的悲哀！」

當台灣的政治場域（包括執政者及反對者）逐漸朝向本土化及台灣化時，台灣的人文社會研究社群中掀起台灣史研究的熱潮，也就是以台灣史為研究主體，放棄早期的「內地化論」（戴寶村, 1989：14）（見本文第一時期的討論）¹⁵。例如，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呼籲「新史觀」的誕生，認為：「一個時代必有一個時代的史學，新的時代往往蘊育出新的史學。」（見《新史學》的〈發刊辭〉，1990年3月份）。對於1990年代的台灣史學研究的走向，他主張，「應以台灣為中心，一圈圈往外認識世界，認識歷史。…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主軸從大中國轉到台灣本土不但是必然的趨勢，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杜正勝, 1997：21）同時，在這股「台灣史研究」熱潮的引領下，中央研究院在1986年推展「台灣史田野研究計劃」，1988年成立「台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年改為「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林美容, 1996:81-82）。

這股「台灣史研究」熱潮也吹向民間社會的一些領域¹⁶。1993

¹⁴ 這些壓力包括來自國民黨本身繼承的危機、反對黨的挑戰及國內的民意及國際的輿論等。

¹⁵ 1990年代初期台灣史研究的情況，見俞南（1993）的整理。

¹⁶ 有趣的是，根據筆者的研究經驗，在舊書市場上，過去台灣史研究的史料往往乏人問津、棄之如蔽屣。但是，當台灣史研究受到重視時，這些資料頓然

年，吳三連史料基金會成立，致力於推動台灣研究並蒐集相關的史料。稍早，自立晚報出版部（當時所有權尚屬吳三連）也出版一系列台灣研究的書籍，包括「台灣經驗四十年叢書」。其中，陳國祥及祝萍著《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描述在政治控制及經濟發展下，台灣報業在不同時期的轉變¹⁷。該書系中另一本李筱峰（1987）所著的《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則以民主運動的發展為主軸，因台灣的民主運動常用媒體（特別是雜誌）作為發聲工具，所以該書對於異議性刊物（如《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及之後的黨外雜誌）的言論多有分析¹⁸。

當「台灣史研究」受到民間社會的重視並已累積成果時，新聞傳播學術界對此卻似乎尚無具體貢獻。更嚴重的是，1986年後，傳播史的論文似乎有大量減少的趨勢（鄭瑞城, 1995：8）¹⁹。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過去專攻新聞史的耆宿學者（如賴光臨、李瞻等）已榮退，而後來者卻青黃不接。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1980年代末期當台灣的傳播學術界開始接收西方批判的思潮時，西方學界正受到「後現代主義」的衝擊；這個主義質疑歷史的真實性，主要分析文本的論述及權力關係；這個思潮的引介可能減少了從事傳播史

洛陽紙貴，往往一頁的檔案資料即價值新台幣千元以上。

¹⁷ 兩位作者的努力值得鼓勵。但是，正如其在該書的序言中所承認的，在撰寫該書時，他們並沒有投入充份的時間，以致有多處疏漏，且文中並沒有適當的引註（1987：15-17）。這種情況十分可惜。

¹⁸ 李筱峰曾任《八十年代》雜誌的執行主編，後專攻台灣史。

¹⁹ 批判學派中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即重視從歷史過程中檢視社會資源的分配、產製與消費（Mosco, 1996:316-317）。從此途徑出發，馮建三（1994）及程宗明（1999b）即以本地過去的傳播個案為研究主題，發表了重要的論文。若專精鉅型理論（如「霸權論」等）的研究者也能注重本土的、歷時性的思考，則未來可能有更多歷史面向的研究問世。

的研究人力²⁰。因此，當其他學科已援筆揮毫譜寫史詩之際²¹，傳播學門卻似乎瞠乎其後、未能急起直追。

即使如此，吾人卻無需懷憂喪志。因為目前新聞史研究似已出現契機。在後威權統治中，人們已逐漸克服過去的「失語症」與「失憶症」，重新發聲，重拾記憶。這些寶貴的記憶為新聞史研究提供重要的素材，並將開啟吾人研究上的想像力。

首先，報禁開放後，各報競相出版社史²²，說明過去所受的壓力。在這之前，新聞控制等議題是公共論述中的禁忌，即使連受控制者也會自我監控。例如，于衡（1971）的《聯合報二十年》及王惕吾（1981）的《聯合報三十年》，談到黨國的新聞控制時，均避重就輕地表示國家利益重於言論自由。又如，當《中國時報》被要求停止發行《美洲中國時報》時，報老闆余紀忠雖痛心不已，當時對外卻若無其事地說是因為「成本提高，市場發展受限，…難於長期維繫…」（《中國時報》，1984, 11, 13:3）。同樣地，《民眾日報》被停刊時，對外也輕描淡寫地宣稱因辦報辛苦，而「休息七天」。

但是，到了這個時期，各報對過去的新聞控制大多侃侃而談、並津津樂道其「英勇」的反抗事蹟。例如，《聯合報》的社史與王惕吾的傳記提到，在1950年代，當國家強行通過《出版法修正案》時，他站在反對陣營的最前線，力爭言論自由；在之後的「雷震案」

²⁰ 台灣對於左派思想的接收史，是值得研究的議題。吾人可進一步思考：在左派思想中，台灣接收了哪些部份？經由那些管道（如早期是偷渡、後來是翻印，之後則是變成簡易的流行書）？由誰引介？如何詮釋？如何用來解釋台灣社會？這些問題將在未來研究中加以探討。

²¹ 例如，社會學界在1980年代即重視歷史研究，見瞿海源與蕭新煌編（1982）。另外，產業組織的研究者也開始重視台灣產業的歷史。見《台灣產業研究》編輯委員會（1999）。

²² 參考黃年（1990）；中國時報四十年編輯委員會（1990）；自立晚報報史編纂小組（1987）；民眾日報社（1990）。

中，他也大力呼籲要尊重言論自由；因此，他承受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如軍中退報運動、總裁點名批判等）（黃年, 1990:54-57; 王麗美, 1994:71-73;92）。《中國時報》的社史也同樣說明該報曾「懷於歷史責任，堅持報人風骨的堅強意志力」，「獨力揭發陶百川事件」、「無懼壓力，忠實報導民進黨組黨事件」等，並因此受到黨內保守陣營的圍剿與打壓（中國時報四十年編輯委員會, 1990:40-50）。《民眾日報》的社史則專章說明該報曾因突破國民黨的言論尺度而受到停刊的經過（民眾日報社, 1990:87-98）。

其次，許多過去受到各種壓力的報人在這段時間也出版了回憶錄，或由他人立傳。這類與新聞史相關的作品主要包括三種類型。

- 一、傳主（即自傳或傳記中的主人翁）曾經參與民主運動、堅持理念而受到多項打壓。例如，《李萬居評傳》中說，李萬居是「盡瘁一生為自由」，其《公論報》則是「自由中國運動」的樞紐與機關報，但卻因此而受到情治單位的盯梢，最後被迫放棄報紙的所有權，以致抑鬱以終（楊錦麟, 1993:269-383）。
- 二、有些傳主本身功在黨國，卻沒有受到應有的「照顧」，下場悲慘。例如，耿修業的《一勺集》（1992:484-485）中指出，《大華晚報》曾經在1970年代前叱吒台北的晚報市場，但是一直謹守國民黨的路線，跟不上社會的脈動，以致於敗給後起之秀《自立晚報》，幾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書中並透露：在開放報禁政策尚不明確時，文工會本來答應替《大華晚報》負擔新台幣一億五千萬元的債務，但獲知即將開放報禁後卻爽約，讓《大華晚報》坐困愁城。
- 三、還有些傳主則根本不曾與黨國對立，卻成為國家恐怖統治的犧牲者。例如，二二八事件中有許多報人受到牽連；這部份在傳統的新聞史中僅一筆帶過。但是，近年來李筱峰（1990）所著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即記錄多位受難的新聞人員的生

平與理念。書中說明，這批本土新聞界的精英與二二八事件時的抗議活動毫無關係；他們會遇害，主要是因為在社會中有崇隆的地位，而受到官方的妒忌。李氏（1998）的另一著作——《林茂生、陳炳和他們的年代》——焦點之一即是林茂生與他主持的《民報》為人民發聲的立場，以及不見容於當局的經過。阮美姝（1992）則為其父親阮朝日申冤，說明他與政治素無瓜葛，卻因為在《台灣新生報》任總經理一職而遭忌，以致蒙受不白之冤。

又如，對於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晚近也有人開始回憶過去殺害無辜、扣上紅帽的情況（藍博洲，1993）。例如，戴獨行（1998:47）回憶說，他本是國民黨員，有一次到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被問到「反攻大陸後應以何種主義號召大陸同胞」時，回答「自由主義」（沒有回答「三民主義」），即被認為黨性有問題，後來甚至被冠上「匪諜」的罪名。

以上所列舉的著作，如同陽光、空氣與水一般，提供未來新聞史研究以成長的環境。首先，這些記憶本身即是基礎的史料，也正是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養分。其次，它們透露種種官方新聞控制的內幕，不僅補足過去新聞史研究不足的部份，也直接挑戰傳統論述的盲點，並開啟吾人對過去更多的想像，以提出更力的解釋。再之，這些記載將提供線索給研究者找尋進一步的史料。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些記憶並非過去的反映。記憶如一本珍藏的相簿；我們在整理相簿時，往往會把美好的、引以為榮的、對自己有利的集合起來，再加些美工與圖案來潤飾與美化，並把它們仔細排好，同時捨棄或銷毀那些不堪入目的、不欲人知的部份。同樣的，寫傳記與自傳也可能包含了選擇、遺忘、美化、隱藏與自圓其說，以保護自己及內團體（Maurois, 1986：113-137；Baumeister and Hastings, 1997）。例如，各報報史現在會把自己塑造

成「新聞自由的鬥士與英雄」，以合乎社會所期望的「社會公器」形象。因此，他們既不會提到曾被國民黨收編、坐享寡佔的好處，也不會說起參與國民黨召開的「宣傳座談」、「新聞會談」、「新聞黨部」等往事，更不會刊出報老闆競爭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排名、競相進入中央常務委員會的經過²³。這些事情過去是權力的象徵；但是，在「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的時空轉換下，它們在今日卻可能被用來指控報業是「威權體制」的共犯。

因此，雖然這些珍貴的回憶資料為目前新聞史研究帶來重要契機，但是研究者必須小心處理。正如翁秀琪（2000：20）所建議的，研究者必須先了解敘事者的觀點，再區分敘事中的意見與事實的部份。對於後者，研究者必須用懷疑及批判的精神加以考證，將之與其他史料交叉比對，找出其衝突點，從中求得最可能的結論（杜維運, 1991:151-173）。在反覆及多方比對的過程中，本土的新聞史圖像將可望更清晰、更能投射出台灣傳播文化的過往與今來。

肆、願景：許台灣的新聞史研究一個美麗的未來

當台灣的新聞史研究蓄勢待發之際，本文分析五十多年來新聞史研究，目的在於找尋知識傳承的軌跡，以做為未來研究的指引。本文假定，在歷史的辯證過程中，不同時期的政治變遷下，新聞史研究可能轉變。具體而言，在威權統治下，研究者用特定的觀點來編寫新聞史，排除不同的解釋，造成某種程度的「失憶症」與「失語症」。直到 1970 年代末期，當反對勢力起來挑戰國民黨的正當性，並提出對立的觀點時，這種「失憶症」與「失語症」才逐漸痊癒。晚近，隨著政治自由化，不同位置的社群正重構歷史，重建記憶，

²³ 參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1994）。

也為新聞史研究帶來契機。

當我們要為新聞史研究再開疆闢土時，前輩學者的研究提供了許多啟示。如本文所分析的，由於威權統治的關係，新聞史研究的涵蓋範圍有限(以1949年之前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新聞事業為主)，解釋的架構也不多(以統治者的觀點為主)。因此，本文建議，研究社群應抱持更開放、更宏觀及更多元的態度，共同來面對不確定的過去，以充實及開闊這個學門的歷史視野。

首先，就研究範圍而言，由於長期以來台灣的傳播史研究幾乎一片荒蕪，我們實應以本土的傳播文化為主體，檢視戰後五十年新聞事業的發展，再回顧1895年來的百年史，更上溯四百年前的傳播活動。在歷史回顧中，我們應思考在歷史中，不同脈絡的文化(如南島文化、漢文化、日本文化、西方文化等)如何交織及交融出本土獨特的文化(吳密察, 1994:91-92)? 在研究課題上，我們除了分析大眾傳播史外，也應分析整體的傳播文化史，包括傳播生態史及心態史(如文化中的思維邏輯)等。如此，我們才能用更宏觀的觀點，來了解台灣傳播文化的連續性與變易性。

其次，就研究觀點而言，我們應尊重並珍重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或衝突的)歷史解釋。目前傳播學門中有不同的典範及理論架構來幫助我們分析現實世界。但是，它們若要真的在台灣生根與深耕的話，則必須以本土的歷史為沃土，不斷地與台灣社會進行對話，否則將如萍水相逢，來來又去去、聚散兩匆匆，也將有如失根的蘭花，因脫離紮實的泥土而無法落地生根。

經由這樣的努力耕耘，我們將能提煉出更精準的概念與架構，用更多樣的語言及更多元的角度來觀照生生不息、處處生機的傳播文化。果真如此，則我們傳播社群將能開墾出一片「百花齊放」、「多音交響」的美麗田園！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 于衡（1971）：《聯合報二十年》。台北：聯合報社。
-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編（1968）：《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 中國時報四十年編輯委員會（1990）：《中國時報四十年》。台北：中國時報社。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中國國民黨職員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 王惕吾（1981）：《聯合報三十年的發展》。台北：聯合報社。
- 王惕吾（1991）：《我與新聞事業》。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王振寰（1989）：〈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二卷一期。
- 王麗美（1994）：《報人王惕吾——聯合報的故事》。台北：天下文化事業出版公司。
- 戈公振（1982）：《中國報學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店。
- 《台灣產業研究》編輯委員會（1999），〈出版緣起〉，《台灣產業研究》，第一期。

自立晚報報史編纂小組（1987）：《自立晚報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San Jose：蓬萊文化出版公司

民眾日報社（1990）：《民眾日報四十年》。高雄：民眾日報社。

朱傳譽（1965）：〈台灣革命報人林呈祿和他所辦的革命報刊〉，《報學》，三卷五期。

朱傳譽（1967）：《宋代報業史》。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杜正勝（1997）：〈一個新史觀的誕生〉，《當代》，一百二十期。

阮美姝（1992）：《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台北：前衛出版社。

汪琪與臧國仁（1992）：〈台灣地區傳播研究初探〉，朱立與陳韜文編，《傳播與社會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pp.397-411。

李筱峰（1987）：《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社。

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李筱峰（1998）：《林茂生 陳炳和他們的年代》。台北：玉山社。

李瞻（1977）：《林樂知與萬國公報》。台北：新聞記者公會。

李瞻（1979）：《中國新聞史》。台北：學生出版社。

- 李瞻（1986）：《新聞學》。台北：三民書局。
- 余英時（1979）：〈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史學評論》，一期。
- 邢頌文（1961）：〈前線日報回憶錄〉，《報學》，二卷九期。
- 杜維運（1991）：《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
- 拓荒者出版社（1979）：《講沒完的政見》。台北：拓荒者出版社。
- 林美容（1996）：《台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臺北：玉山社。
- 林濁水（1982）：〈還我言論自由——三十年自由奮鬥史〉，《博觀雜誌》，三期。
- 林麗雲（1999）：〈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社會結構、語言機制與認同建構：大眾媒介如何編織美麗島事件並構塑民眾的族群與國家認同》，1999年10月2日。台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 林麗雲（2000）：〈為台灣傳播研究另闢蹊徑？傳播史研究與研究途徑〉，《新聞學研究》，六十三期。
- 吳三連與蔡培火（1971）：《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 吳哲朗（1978）：《黨外的新聞——台灣日報辛酸史》。作者自印。
- 吳密察（1994）：〈台灣史的成立及其課題〉，《當代》，一〇〇期。
- 吳濁流（1988a）：《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

- 吳濁流（1988b）：《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前衛出版社。
- 吳濁流（1988c）：《無花果》。台北：前衛出版社。
- 俞南（1993）：〈台灣史研究的新頂峰〉，《當代》，八十七期。
- 洪桂己（1957）：《台灣報業史研究》。台北：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洪桂己（1962）：〈光復以前的台灣報業〉，《報學》，二卷十期。
- 翁秀琪（1999）：〈多元典範衝擊下傳播研究方法的省思：從口述歷史在傳播研究中的應用談起〉，《新聞學研究》，六十三期。
- 徐詠平（1946）：〈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黨報發展史略〉，《報學》，一卷九期。
- 徐詠平（1960）：〈東京民報之研究〉，《報學》，四卷五期。
- 徐詠平（1973）：《革命報人別記》。台北：正中書局。
- 耿修業（1992）：《一勺集》。台北：里仁書局。
- 郭廷以（1954）：《台灣史事概說》。台北：正中書局。
- 莊英村（1985）：〈你辦報,我不放心---從光復迫害到現在的報業血淚〉，《前進週刊》，二十四期。
- 陳紀滢（1957）：《報人張季鸞》。台北：文友。
- 陳紀滢（1974）：《胡政之與大公報》。香港：掌故月刊社。
- 陳紀滢（1981）：《抗戰時期的大公報》。台北：黎明書局。
- 陳國祥（1978）：〈新聞自由的歷史對照〉，《夏潮》，四卷五期。

陳國祥與祝萍(1987)：《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部。

馮建三(1995)：〈異議媒體的停滯與流變之初探：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台〉，《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學：析論1990年代台灣廣電媒體的若干變遷》，台北：唐山出版社。

莫爾(Mohr, Wolfgang)(1979)：《現代中國報業史》。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基金會翻譯及影印本。

程宗明(1999a)：〈析論台灣傳播學研究/實務的生產(1949-1980)未來—從政治經濟學取向思考對比典範的轉向〉，收錄於林靜伶編《1998傳播論文選集》。台北：中華傳播學會。

程宗明(1999b)：〈對台灣戰後初期報業的原料控制(1945-1967)---新聞紙的壟斷生產與計畫供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三十六期。

葉啟政(1994)：〈對社會研究「本土化」主張的解讀〉，《香港社會科學學報》，三期。

黃年(1990)：《聯合報四十年》。台北：聯經出版社。

張其昀編(1984)：《蔣總統言論集第三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

張炎憲(1996)：〈台灣史研究與台灣主體性〉，收錄於張炎憲等編《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曾虛白編(1966)：《中國新聞史》。台北：三民書局。

楊錦麟(1993)：《李萬居評傳》。台北：人間出版社。

劉光炎（1952）：〈抗戰期大後方新聞界追憶〉，《報學》，一卷二期。

劉光炎（1956）：〈重慶各報之「聯合版」〉，《報學》，二卷七期。

潘家慶（1997）：〈第一等大事，豈可等閒視之〉，《傳播研究簡訊》，十期。

鄭瑞城（1995）：《「傳播學門現況與發展研討會」結案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劃。

賴光臨（1968）：《梁啟超與近代報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賴光臨（1970）：《萬國公報之言論與影響》。台北：政大學報。

賴光臨（1971）：《清末新型官報之興起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第八期抽印本。

賴光臨（1981）：《七十年中國報業史》。台北：中央日報社。

賴光臨（1978）：《中國新聞傳播史》。台北：三民書局。

賴光臨（1984）：《新聞史》。台北：允晨文化。

賴光臨（1987）：《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台北：台灣商務書局。

瞿海源、蕭新煌編（1982），《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戴豐（1960）：〈「掃蕩報」小史〉，《報學》，二卷七期。

戴獨行（1998）：《白色角落》。台北：人間出版社。

羅文輝（1995）：〈台灣傳播研究的回顧（1951-1995）〉，《分析社會的方法》。台北：國立空中大學、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立屏東師範學院聯合出版，D1-D40。

藍博洲（1993）：《白色恐怖》。台北：揚智出版社。

戴寶村（1989）：〈台灣是台灣史研究的重心：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論壇》，三三八期。

英文部份

Anderson, B. (1999[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圖書公司。

Appleby, J. et al. (1995[1994]).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薛絢譯：《歷史的真相》。台北：正中書局。

Baumeister, R.F. and Hastings, S. B. (1997). How Groups Flatter and Deceive Themselves. In Pennebaker, J. W. et al. (eds.).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Publishers, pp.277-293.

Burke, P. (1997).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arr, E. (1987). *What is History?* Harmondsworth : Penguin, second edition.

Collingwood, R.G. (1981[1942]). *The Ideas of History*. 陳永福譯：《歷史的理念》。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Gaskell, G.D. and Wright, D. B. (1997) . Group Differences in Memory for a Political Event. In Pennebaker, J. W. et al. (eds.) . *Collective Memory of Political Events*.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Publishers, pp.175-189.
- Gramsci, A. (1979a) . Hegemony (Civil Society)and Separation of Power. In Mattelart A. et al.(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vol.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p.97.
- Gramsci, A. (1979b) .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Mattelart A. et al.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vol.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pp.99-100.
- Gramsci, A. (1983) . Gramsci: Prison Notebook. In Held, D. et al. (eds.) . *State and Societie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bwachs,M. (1992) . *On Collective Memory*. English Trans. Lond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urois,A.陳蒼多譯 (1986) : 《傳記面面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Douglas, M. (1986) . *How Institutions Think*. London : Routledge &Kegan Paul.
- Mills,C.W. (1959) .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sco, V. (1998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馮建三與程宗明譯，《傳播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出版社。

Ranke, L. (1970). The ideal of universal history : Ranke. In Stern, F. (ed.) .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London: Macmillan.

Shotter, J. (1990). The Social Constuction of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 Middleton , D. and Edwards, D. (eds.) . *Collective Remembering*. London: Sage, pp.121-138.

Toynbee, A.J. (1963).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elizer, B. (1995). Reading the Past against the Grain: the Shape of Memory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June, 1995, pp.214-239.

Weber, M.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Critical Overview on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istory in Taiwan

Lihyun LIN ****

Abstract

This paper engages to examine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istory in Taiwan. It is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in the dialectic historical process, at different phase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istorical study in Taiwan has undergone changes. Under the long authoritarian rule, historical writings provided particular interpretations, excluded others, and resulted in *social amnesia*.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1970s, when the opposition rose, that alternative views emerged from below. With the current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different groups are recollecting their memories, which forecast the dawning of a new journalism history. In prospec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should explore how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come and converged into a unique one, in order to broaden the historical horizon of this field.

Keywords :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istory,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studies, history and time, history and politics

**** The author teaches at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u-Jen University. Email: maco1049@mails.fju.edu.t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1961

Copyright © 1961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may not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nc.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Data